

宋濂寓言注译

马 达 注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宋濂寓言注译

马 达 注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宋濂寓言注译

马 达 注译

· 宋濂寓言注译

马 达 注译

责任编辑：高质慧

封面设计：徐德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75·字数95,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

ISBN 7-5316-0445-0/I·19

定价：1.10元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目 录

宋濂寓言初探（代前言）	(1)
波斯鱼	(15)
人虎说	(17)
钻燧说	(19)
乌鸦与蜀鸡	(21)
一根樗木柱子	(22)
争宠	(25)
角象龙鸣	(29)
阳都之山的熊	(32)
列宗子泓	(33)
昭宣县购牛	(36)
齐景公惩奢	(40)
卢蒲就魁讽谏	(43)
越人溺鼠	(45)
栾氏之客	(47)
斗子般	(50)
请猴子喝酒	(52)
西玉须	(53)

悔盟.....	(56)
牛尾狸.....	(58)
驯鹳.....	(60)
郑人爱鱼.....	(63)
楚王索珠.....	(64)
治国之要.....	(66)
揖让救火.....	(69)
子寥慎妃耦.....	(72)
捭阖之术.....	(74)
王鲚.....	(77)
南文子狂易.....	(80)
爱说大话的尊卢沙.....	(82)
子旗献珉.....	(85)
二者不可缺一.....	(88)
养豹捕鼠.....	(91)
韩君择鹑.....	(93)
白雁落网.....	(95)
鼓肱长鸣.....	(96)
铁剑.....	(98)
用猪代牛耕田.....	(101)
北宫殖得珠.....	(103)
奔走求首.....	(106)
琴谕.....	(107)
闽姝.....	(110)
丐者贱儒.....	(114)

束氏狸狌	(115)
晋人好利	(118)
剡股藏珠	(120)
身有至宝	(121)
焚鼠毁庐	(123)
冒充博物	(125)
吴起守信	(127)
子之佯言	(128)
制箭的人	(129)
大狙鄙氏	(131)
真假汉鼎	(133)
观渔	(135)
虞丹子焚经	(138)
阴险的申生	(140)
逐虺	(143)
后记	(146)

宋濂寓言初探(代前言)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元末至正中，曾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他以亲老为借口，辞不赴召。1360年，接受了朱元璋的征聘，任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明开国后，曾奉命主修《元史》，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后年老辞官归田，不久因长孙宋慎获罪被牵连，全家谪迁茂州，中途在夔州病死。

宋濂是明初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散文作品中，一些传记文和记叙文都写得很好。传记文中，《王冕传》、《胡长儒传》、《秦士录》、《李巽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记叙文中，《桃花涧修楔诗序》、《看松庵记》、《送东阳马生序》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但宋濂又是一个杰出的寓言作家，写了许多优秀的寓言作品。他在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入龙门山，在山中著书十余年(见郑楷：《潜溪先生宋公行状》)。至正十七年(1357)春正月，他将历年写的哲学著作，编成《龙门子凝道记》上、

中、下三卷，里面收有寓言三十多篇。这一年的夏五月，他又将他写的寓言四十篇，编成了寓言专集《燕书》。此外，他还写了《寓言五首》，有些寓言和寓言色彩很浓的作品，散见在他的文集中。现在能见到的宋濂寓言，共约八、九十篇。这些寓言，绝大多数都写得很好。

既然宋濂写了这么多优秀寓言，为什么长期以来，几乎却不为人所知呢？已编就的一些文学史虽然很称道宋濂的散文，对宋濂的寓言却只字不提。有的文学史，虽然提到了《燕书》，但只是略举其中一篇，一笔带过。只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到了宋濂的《燕书》、《龙门子凝道记》这两部寓言体散文集，但语焉不详，没有给它们以应得的评价。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宋濂的寓言几乎全部写在元朝末年，当时宋濂没有做官，只是一介书生，课徒糊口，生活比较贫困，有机会接近群众，了解民间疾苦。他目睹当时社会的动乱，哀民生之多艰，不能不“为斯世病”（《龙门子凝道记·采苓符》），于是他很自然地拿起了寓言这个锐利的武器。他自己就曾这样声称：“予所著书，随所见笔之而感慨系之矣！”（《龙门子凝道记·令狐微》）到了明朝，他的地位高了，连祖先妻子都得到了封赠，朱元璋很倚重他的文才，《明史·宋濂传》说：“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这些都是应酬文字，如果勉强称之为文学的话也只能算是不折不扣、四平八稳的“奉命文学”，哪里还能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宋濂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主要是指这

些。在这种情况下，宋濂又哪有时间和心思创作寓言，别人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那些皇皇大文上面，又怎么会重视宋濂在元末写的寓言？

元朝末年，也许是由于统治者岌岌可危，自顾不暇，文网还是较疏的，宋濂写这些寓言顾忌较少，文风也是比较泼辣奔放的。到了明朝，朱元璋对待臣下非常严酷忌刻，经常派特务刺探臣下的隐私，对宋濂也不例外。《明史·宋濂传》有这样的记载：“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饔饩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欺朕。’”在这样的高压气氛下，宋濂不但不敢再写寓言，连原来写的寓言也不敢拿出来，更不敢付梓问世。这一点，前人已经注意到了，康熙三年（1664），张洵写的《宋濂先生文集未刻本序》就说过：“洪武时禁网严密，举朝动色相戒，虽君臣相得莫如宋文宪公，而深沉不泄，辄温树以自警，则所著文词，有当传不当传者，亦何敢尽公天下，自贻臭兀？”当然，那些犯忌的寓言，是在“不当传”、“何敢尽公天下”之列的。

正是由于这些，宋濂的文集虽有多种，但他的寓言从未独立成集出书。《龙门子凝道记》不但从未单独印行，甚至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收入他的文集，直到清代嘉庆年间，严荣还说：“至所著《龙门子凝道记》，其刻未有闻焉。”“《龙门子凝道记》一书，诸刻（指宋濂文集的各种刻本）中无有也。”《燕书》本有四十篇，康熙四十八年（1709）彭端扈刻《宋学士全集》卷二十七只收录了十六篇。嘉庆十五年（1810），严荣刻《宋文宪公全集》，才收入了全部《燕书》和《龙门子凝道记》。这个本子，以后刻本很少，见到的人不多。由于以上种种原因，

使得宋濂寓言这颗明珠，被埋没了许多年。

真正的明珠，拂拭掉蒙在它上面的灰尘，总是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的。

二

宋濂的寓言，绝大部分写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及这以前的几年。元末，以蒙古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对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十分残酷。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仆。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民不聊生，只得铤而走险，红巾军和其他起义军遍及全国。宋濂生处元朝乱世，对这些感受极深。他把他的这些感受，都在寓言中曲折地反映了出来。

宋濂寓言深刻地揭露了元末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如《龙门子凝道记·观渔微》，龙门子观鱼于河，看到“河当屡渔之后，鱼大者长径指耳。”作者忍不住直言指斥当权者说：“在位者，若公若卿若大夫士者，果皆贤者乎？是宜国家失太平，干戈万里，掠人为粮，甚或载盐尸以行。生民之类，不绝如缕，而况于鱼乎？”《龙门子凝道记·采苓符》中还描绘了“剑稍交横，白骨不葬，高如丘陵，一遇天阴，鬼夜哭相闻”，“宫室化为灰烬，生民流亡，伥伥无所依……求生丐死，两无其谋”，“田野荒芜，五谷不生”的悲惨情景。这些不是元末社会现实的写照吗？《燕书》中的《郑人爱鱼》，寓言中的郑人把捕获的鱼玩弄至死，宋濂指出“民犹鱼也”，把“今之治民者”比作郑人，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和控诉。《燕书》中还有一篇寓言《牛尾狸》，牛尾狸只是由于它“味旨甚”，无论它怎样防范，也逃不脱猎人猎犬踪迹。宋濂在寓言的结尾感叹地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信矣！”统治阶级残酷压榨迫害老百姓，老百姓有什么罪呢？只本过因为他们有勉强可以蔽体糊口的衣食，统治者要强行加以掠夺罢了。宋濂的文章，在人们心目中，是“辞调尔雅，如殷周彝，龙纹漫灭，古意独存”（欧阳元：《宋濂文集序》），但他在写这些寓言时，却禁不住剑拔弩张了。《礼记·乐记》中说：“乱世之音怨以怒”，宋濂的寓言，真可以说是元末乱世的人民之声呵！

宋濂寓言对元末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等阴谋手段，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如《龙门子凝道记·秋风枢》中的寓言《晋人好利》，这个晋人，到了市场上遇物即攫，有其哂笑他，他还用手指着人骂道：“世人好利甚于我，往往百计而阴夺之，吾犹取之白昼，岂不又贤于彼哉？”好象有些强词夺理，实际上通过这一对比，对那些百计阴夺的统治者的本质，揭露得更深刻，更淋漓尽致。《龙门子凝道记·士有微》中刻画了一个阴险人物的典型。这篇寓言中的申生，依靠一位权贵，得免饥饿，当了言官，当这位权贵势衰的时候，他又另攀高枝，揭发权贵的阴私，陷害权贵，反过来劝权贵自杀。宋濂在另一篇寓言（《龙门子凝道记·大学微》中的《逐魑》）中痛斥这一类人是“人魑”说：“厚貌深情，祸机莫测，是人魑也；斜睨倾听，伺人阴私，是人魑也；睚眦之怨，必逞其欲，是人魑也；布机陈阱，以中以陷，是人魑也。”统治阶级中这种“人魑”太多了，宋濂主张用“先王之教”去感化他们，表现了他思想的局限性。《燕书》中有一篇《乌鸦与蜀鸡》的寓

言，母鸡担心隼风叼去小鸡，小心防备，隼风没有办法，乌鸦飞来在小鸡旁啄食，母鸡丧失了警惕，乌鸦出其不意把一只小鸡叼走了。宋濂用这个故事比喻齐国表面上与燕国交好，实际上想麻痹燕国，乘机偷袭。其实，在这个比喻中，不但喻体是寓言，本体也是寓言，都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阴险本质。

宋濂寓言还广泛揭露了元末统治阶级和官场的各种腐败现象。如《燕书》中的寓言《王鲋》，在王鲋得势的时候，“横行海内，孰敢向问之者”，等到它一旦失势，就人可齑割，鸟可群啄了。这就是不可一世的横行霸道的统治者的可悲的下场。又如《龙门子凝道记·秋风枢》中的《束氏狸狌》，以善于捕鼠的狸狌其后代反而畏鼠为喻，尖锐地讽刺了世享重禄的武士和世家子弟。《龙门子凝道记·司马微》中的寓言《真假汉鼎》，有权势的人的假鼎，被人认为是真汉鼎，而真正的汉鼎，反倒被权贵和那些趋炎附势的人认为是假鼎，作者借故事中人物之口慨叹地说：“吾今然后知势之足以交易是非也！”《燕书》中的寓言《悔盟》，王戴生和三乌松臣两人，在贫贱时共同发誓，他日当了官决不去奔走权门，但到他们真的做了官，就都撕毁盟约，瞒着对方去奔走权门了。这些，不是具体而微的官场现形记吗？

宋濂寓言的笔触，涉及到了元末社会的各种丑恶世态和不良风气，对之或揭露讽刺，或婉言讽谏。如《燕书》中的寓言《蓼卢沙》，讽刺了毫无真才实学，夸夸其谈的人。《龙门子凝道记·君子微》中的寓言《矢人自负》，讽刺了那些没有过硬本领，而又只爱听恭维话，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的人。《龙门子凝道记·尉迟枢》中的寓言《焚鼠毁庐》，对那些只图一

时痛快，不顾严重后果的人，进行了善意的规劝。《龙门子凝道记·秋风枢》中的寓言《弓射贱儒》，尖锐地讽刺了饮食贱儒，也曲折地反映了元代所谓“九手十儒”的儒者的贱地位。而《燕书》中的寓言《西王母》，作者对那些忘恩负义的小人，则表现了深恶痛绝的态度。

宋濂是一个具有盖世才华的人，在元末社会大动乱的时期，是非颠倒，“怀才”的人，只能“不遇”。他在《龙门子凝道记·终宵符》里说：“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虽然，荆山之玉，非不美也，卞氏献之，而双足见刖。”他不愿作双足见刖的卞氏，所以终元之世，没有出仕。但他在选拔用人问题上，看到的很多，感慨也很多，因此，他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寓言。如《燕书》中的寓言《狎豹捕鼠》通过豹不善捕鼠而善捕兽，说明使用人要根据他的才能，安排他以适当的工作岗位，才可以人尽其才，决不可在他的工作安排不当，其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因而工作没有什么成绩的时候，反而认为他是庸才，给他以不公平的待遇。《燕书》中的寓言《子且鼓肱长鸣》，以尧舜虽是大圣人，捉鸟也得依靠鸿鹄喻，说明领导者不应轻视群众，而应相信群众，善于在群众中发现各种各样的人才，即使只有一技之长的，也要做到因才使用。《寓言五首》中的商於子，率家耕田，当有人批评他不耕牛耕田，是“颠之倒之”的时候，商於子发了一通感慨：“子以子颠之倒之，予亦以子倒之颠之。吾岂不知溉田必以牛，亦犹牧吾民者必以贤？不以牛，虽不得苗，其害小；不以贤，则天下受祸，其害大。子何不以无我者无牧民者耶？”这样，把批评的锋芒就直接指向掌握用人权的牧民者乃至最高统治者

了。这篇寓言，可以说是有胆有识，文笔也够泼辣的。

宋濂继承了先秦诸子用寓言阐述其哲学和政治思想的传统。他在《六经论》中说：“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他在《龙门子凝道记·天下枢》中更进一步提出：“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龙门子凝道记·慨世枢》中有一篇《梦见圣人》的寓言，说明“心中有圣人”，得出“圣人在吾身尔，何劳外慕哉”的结论。《萝山杂言二十首》（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八）中有一篇很短的寓言说：“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尔首不亡也。’指以示之，泠然而悟，学者之于道亦然。”这里所说的“道”就是“心”。《龙门子凝道记·先王枢》的寓言《身有至宝》，以西域贾胡持宝来售，其所谓宝，既不能充饥，又不能治病设棺，说明每个人都身有至宝，“用之则天下宁，不用则身独安。”这里所说的“至宝”，也是指的“心”。《燕书》中的寓言《角象龙鸣》，故事中的酈国大夫吹角学龙叫，他学的龙叫本来是假的，以后听到三足熊的叫声，以为是真龙叫，又想放弃过去学的假龙叫，去改学三足熊的叫声。宋濂通过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儒生，都自以为得到了孔学真传，其实都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呢，就是所谓“心学”。宋濂的“天下之物心为大”的哲学思想，对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乃至李贽的“天下无一人不生知”（《焚书·答周西岩》）的观点，影响都很大。宋濂的政治思想发展了孟子“民为贵”的观点，认为“君为民立”。在《燕书》中的寓言《卫灵公问治国》里，作者借蘧伯玉的口说：“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则君，舍之则独夫耳，可不畏哉”宋濂在这篇寓言的末尾还进一步指出：“天

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则君为民立，民亦重矣哉！”元末统治者虐待和迫害人民，无所不用其极，宋濂竟针锋相对地提出“虐之非君也”、“舍之则独夫耳”，是与当时广大人民呼吸相通的。在《燕书》中的寓言《齐顷公欲赋民》里，宋濂借卢蒲就魁之口揭露说：“立国养民，古也；瘠民肥国，今也。”反映了元末赋税几倍几倍地征收的残酷现实，他希望能有象这篇寓言中的袁娄宰那样的为民作主的人。《龙门子凝道记·虞丹微》中，宋濂更慨乎言之说：“古之为将者，将以生民；今之为将者，将以杀民。凡人君之命，将以为民也。民在死地而不能存，则愚所以生之，去其害民者尔。今乃务杀之，草薶而禽猕之，民果何罪焉？”联系元末统治者的军队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社会现实看，宋濂的同情心，无疑是在农民起义军一边的。

宋濂有些寓言的寓意，还有待我们深入探讨，如《燕书》中的寓言《庄蹻过商丘之墟》，就决不能只从表面上肤浅地去领会它的寓意，而应从元代社会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整体看，从宋濂个人遭遇和出处操守的生平看。这篇寓言通过对几个妇女赧颜事仇，反而争宠的讽刺，抨击了那些在元贵族高压统治下丧失气节、贪图富贵、助纣为虐的无耻之徒，这篇寓言末尾的“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是多么沉痛的、撼人心弦的呼号呵！

三

宋濂的寓言在整体布局上、结构上、写作上都很具特色。

他的寓言绝大部分是大型的成组的寓言。《燕书》多达四十篇，合之可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分之又都可以单独成篇。《龙门子凝道记》中的寓言也有三十余篇之多，其布局与《燕书》又不一样，除少数单独成篇的寓言外，大部分是穿插性寓言。这个布局是由于这些寓言主要是为了阐述作者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所决定的。宋濂的寓言在结构上，往往是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小故事是寓言，整个大故事也是寓言。通过这种连环式的或同心圆式的寓言，使寓意得到了比单个寓言更完整、更深刻的阐述。这种结构，有些类似印度寓言。宋濂精于佛学，他的寓言多采这种结构，也许是受到了印度寓言的影响。

宋濂的寓言大部分是托古讽今的。《燕书》四十篇全部托言春秋战国时候的事，这正如宋濂在《燕书》的序言里所说的：“辩士设喻，以风以陈，质往旧，开今新”，也不仅是托言古事，“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也”（郭象，《庄子注》），更重要的是托言古事，作者可以较少顾忌，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如《燕书》中的一篇寓言《南文子狂易》，作者通过南文子指斥朝政说：“今国中法度不定，上下无章，驍暴者虐民，屏夫操弓矢出斗。”象这样尖锐的直言不讳的抨击，如果不是出之寓言，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不过，南文子托谏以悟卫君，只是作者的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

宋濂善于学习前人寓言特别是先秦寓言，如《燕书》中的寓言《齐顷公欲赋民》，即从《说苑·正谏》“烛维主鸟而亡之”化出，但较《说苑》更为尖锐，《龙门子凝道记·秋风枢》中的寓言《晋人好利》，即从《列子·说符》化出，但较《列子》更为

拔辣；《燕书》中的寓言《子且鼓肱长鸣》，脱胎于《战国策·齐策》“海大鱼”和《说苑》“危如累卵”（见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不见今本《说苑》），而较后者更为透辟，《燕书》中的寓言《驯鹳》，脱胎于《列子·黄帝》“梁鸯养虎”，而较后者更为深刻。宋濂学习前人寓言，而能做到推陈出新，这是与他“博极天下群书，凡天文地理之要，礼乐刑政之详，治乱沿革之变，草木虫鱼之细，与夫百家众技之说，靡不究心”（郑渊：《宋濂文集序》）分不开的，所以，宋濂的文章，能够做到“与古作者并”（《明史·宋濂传》），“杂于古人篇章中，盖甚难辨。”（欧阳元：《宋濂文集序》）

宋濂是一个史学家，他主修过《元史》，他的文集中，有许多优秀的传记文，他把传记文的写作方法，引进到了寓言创作中。当然，寓言故事中的人物，不同于史传中的人物。史传中的人物，可以在写他的一生中逐步展示他的性格；而寓言中的人物，只能在寓言主题的制约下，刻画他的性格特点，使其形象有立体感。宋濂笔下的寓言形象，如西王须的忘恩负义，玉戴生和三乌丛臣的背约而奔走权门的矛盾不安的心理状态，成阳纳的迂腐误事，商於子的愤世疾俗，都只寥寥几笔，就把人物的性格特点，鲜明地勾勒出来了。

宋濂的寓言，也充分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但由于宋濂寓言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即使是他寓言中的古代人物的活动，也只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折射。因之，他的寓言中的夸张手法，是“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的，做到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如《燕书》中的寓言《尊卢沙》，作者采取多层次